

总编 王咏杰

宁波文史系列丛书

第一辑

商海巨子

活跃在沪埠的宁波商人

5
中国文史出版社

序

王 永 杰

编纂出版一套反映近现代宁波籍人士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活动的情况,从一个侧面揭集近现代宁波区域个性的系列丛书,是我们酝酿已久的一个想法。产生这一想法的最初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我们感到宁波在激宕剧变的近现代中国是占有一定分量和位置的一个区域,虽然她在中国版图中所占比例甚小,然而生发出来的生活观念和经营实绩却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掀起了持续的冲击波。这一现象可以从多个层面加以诠释,且已引起了不少海外学者敏锐而热情的关注。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特别是宁波本地鲜有深层

次研究，以致人们往往对宁波这一段丰厚历史相当隔膜。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长时期来对历史资料疏于系统积累、整理和介绍，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缺失。弥补这一缺失，政协文史资料理应承担一份责任。为此，我们将我们的工作角度稍稍作了转换，从“三亲”史料外延至资料整理，并力图与普及历史知识进而与近现代区域史研究接通管道。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即是探寻曾经存在过的区域个性，为当前正在进行的宁波文化建设和未来文化发展规划提供借鉴。事实上，探寻曾经存在过的区域个性是一个需要为之付出艰辛努力、融各个学科方法于一体、宏观描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巨大课题。我们不敢亦无力奢望通过一套丛书就能把区域个性揭示清楚，我们只是想通过对曾经拥有过的历史现象（这里仅以历史人物为聚焦点）作一番尽可能客观而系统的梳理与介绍，给人们认识近现代宁波区域及其特有个性提供一点可供思考的背景材料。揭示曾经拥有过的区域个性，是我们的理想目标，虽然目前尚无法达到，诚望文史爱好者和有心人共同来登堂探奥；建设现实文化和构筑未来文化发展框架则是一项巨大而艰辛的工程。这里所说的文化当然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至少亦应有与经济、政治一样共托社会结构的地位。据此，我们认为，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地区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重要标志，是一个地区外在形象的个性化意蕴。所以，重视文化建设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觉培植区域个性、保持区域特色的过程。而培植区域文化个

性，离不开对文化历史的考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说，要对自身文化(包括历史和现状)有一个“自知之明”，这就是“文化自觉”，只有做到“自知之明”，才能“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见《读书》1997年第10期费孝通《跨文化的“席明纳”——人文价值再思考二》)。由此，我们很愿意告诉读者朋友，从酝酿筹划这套丛书的起始，我们就把它当作一项文化积累和建设性工作来做，并期望所有宁波籍人士和关心支持宁波文化建设的朋友从本丛书所胪列的人物现象引伸开去，从各个角度关注、探究产生这些人物现象的母域社会结构律动与社会价值体系嬗变的背景和客观走向，从而为宁波现实文化和未来文化如何赓续传统、超越传统、塑造富有活力的新个性贡献良智善策。

本丛书共分三辑，其中第一辑为经济方面的人物专题，名为《商海巨子——活跃在沪埠的宁波商人》，通过对晚清以来特别是近现代时期宁波籍著名实业家、商人在上海滩经商始末的详尽记述，揭示宁波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占有的某种特殊地位；第二辑为政治方面的人物专题，名为《政坛名人——民国政治舞台上的浙东人物》，通过对民国时期从宁波乡间一步步走向中国政治舞台的一大批人物个体史料的梳理与汇集，明晰民国时期宁波社会的价值变动之繁杂性；第三辑为文化方面的人物专题，名为《文化群星——近现代宁波籍文化精英》，则通过一个个具体文化人的单体活动或一个个文化家族的群体发展的描述，凸现近现代宁波社会的文化氛围与文化场景。这三辑内容，在我们看来，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印证，

分之独立成篇，合之浑然一体。需要说明的是，近现代宁波籍名人成千上万，且大多在外埠活动并产生影响，囿于条件所限，收入本丛书的仅仅是其中极小部分。如果假以时日，各方条件许可，那么我们将会继续作出努力。

本丛书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协作成果。无论是选题与写作体例的确定，还是入选稿件的统改，都是在众人友好讨论气氛中得以进行和竣工的。虽然各个作者写作风格各有不同，但从总体上看，我们原先确定的本丛书采用述评体写作方法，以述为主，以评为辅，述的部分力求平实稳妥，评的部分力求公允客观，使之史料性、可读性、学术性有机统一的目标已基本达到。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所选录传主的排列先后以出生年月为准。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真正成为读者进一步了解宁波近现代历史的一道风景线，更希望广大读者对丛书的不当乃至错误，不吝赐教。

是为序。

1997年11月

总 编	王永杰	
副 总 编	成岳冲	陆冰杨
	宋静之	俞维钧
本辑主编	陈梅龙	
副 主 编	孙善根	

目 录

前言	陈梅龙	(1)
一代名商朱葆三	陆志濂	(9)
近代民族印刷业的开拓者之一——鲍咸昌	汪仁泽	(20)
从买办到民族企业家——上海“闻人”虞洽卿	冯筱才	(38)
中国银行的奠基人——宋汉章	景消波	(70)
善于经营的医药商人黄楚九	诸焕灿	(91)
旧上海风云人物傅筱庵	朱爱武	(100)
从外贸商人到橡胶工业的先驱——余芝卿	陆志濂	(114)
德商颜料买办周宗良	冯筱才	(124)
孙衡甫与新式金融、工商业	俞信芳	(132)
邬挺生与中国烟草业	冯筱才	(152)
中国钱业界元老秦润卿	陈梅龙 王乜春	(167)
西药巨子、爱国企业家项松茂	杨兵杰	(187)
爱国爱乡、热心救助的实业家贾廷芳	孙善根 汪仁泽	(206)
有“红色资本家”之誉的包达三	汪仁泽	(220)
陈万运与他的三友实业社	孙善根 陆志濂	(231)
中国近代大实业家刘鸿生	周静芬	(247)
从学徒到上海总商会主任委员——俞佐庭	陆志濂	(283)
中国化学工业社创始人方液仙	陈保中	(293)
“亚字牌”灯泡的开拓者胡西园	钱茂伟	(308)

- 李康年与中国国货公司 沈雨梧 (317)
信谊药厂董事长、总经理鲍国昌 汪仁泽 (322)

附录一 部分旅沪宁波商人简传 陈梅龙辑

穆炳元(334)王槐山(334)杨 坊(334)叶澄衷(335)
严信厚(336)方椒伯(336)许春荣(337)王伯元(338)
贝润生(338)严裕棠(339)李云书(340)周晋镛(341)
盛丕华(341)宋炜臣(342)乐振葆(343)

附录二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旅沪甬人创办的主要企业、

航运及金融机构简表 陈梅龙编 (344)

前 言

陈 梅 龙

—

鸦片战争后宁波商人大量旅沪，这同鸦片战争后宁波社会经济的变迁有着密切关联。宁波在鸦片战争前就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区，群众谋生维艰；鸦片战争后，随着自然经济的瓦解和商品经济的活跃，这一矛盾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深化。这就导致了大量人口的外移。

同时，大量人口的趋沪同上海社会经济演进也有着密切关系。鸦片战争前，上海在东南沿海中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区域中心。鸦片战争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随着五口通商后外洋商品的大批涌集，上海以其襟江带海的特殊优势，成为全国的贸易中心。据记载，1844年上海的对外贸易总额仅为286万两，而到1863年已激增到1亿两。这就形成了宁波商人向沪上的大量

集结。

最早登临上海滩的是方介堂、李也亭^①等家族，大约在1830年前后，他们已在糖业、沙船等业中居有重要地位。接着蔡同德、孙增来等人也在上海举办洋布业、呢绒业。

除了纺织、食糖等日常用品以外，宁波商人在五金、钢铁等重要生产物资领域也有很大投入。开头是叶澄衷，接着是洪益三，以后又有戴运来、周可文。90年代以后宁波商人又向西药、颜料等发展，贝润生、秦君安、黄楚九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

甲午战争以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是宁波商人在上海开发经营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宁波商人在经营商业的同时对近代工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前的洋务时期，宁波商人已开始了对近代工业的契入。何金泉、郑良裕、周梦湘等都是当时有名的企业家。甲午以后，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渐长，宁波商人更对上海的近代工业进行大量开发。始有1890年叶澄衷创办燮昌火柴厂，接着1894年创办东信机器厂，以后蔡方源、赵孝林、孙荣泉又分别创办了协泰纺机厂等新工业。

宁波商人不仅对轻纺、机修工业颇有属意，对科技含量较高的化学、医药也有很大投入。中国化学工业社、天厨味精厂、大中华橡胶厂等都是这一时期创办起来的。至20世纪20年代，在沪的宁波商人约已达50万人以上，创办的工商企业约达2 000个。^②

^① 方介堂(1783—1846)，镇海柏墅人，望族。早年在镇海憩桥开设粮店、杂货铺，稍有积蓄后去沪营商，多有发展。

李也亭(1807—1868)镇海小港人，15岁时赴沪，初时在南码头曹德大糖坊当学徒，后转向于沙船业、钱业，颇具成就。

^② 宁波十年海关报告(1912—1921)称：其时“有三分之二的宁波人移居到上海”；而据1931年当地的人口调查，宁波市区人口为741 760人；全地区(市区、象山、奉化、定海、慈溪、镇海、南田)共2 379 301人。据此推断移民数为50万人，尚不包括全区各县移民。此处企业数据1941年2 230家而推断。

抗日战争前后至大陆解放前夕，这是宁波商人在沪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个阶段最大的历史事件就是抗日战争。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略中国。国土沦丧，人民遭殃。上海也是社会不宁，物价暴涨。宁波商人的经营活动遭到了严重阻滞。1941年12月，上海沦陷。宁波商人的大批企业被迫迁往内地。租界内的工商业也一片凋敝。部分商业人员或返回家乡，或流落他乡。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期，宁波商人创办上海近代工商业的意志并没有动摇。一旦日本侵略者退出上海，一些原来迁往内地的企业便纷纷归来，加紧生产。一些商人还乘机开创新的企业，李康年的萃众毛巾厂、中国钟厂都是此时间世的。

宁波商人的创业活动，为上海近代经济的繁兴添上了绚丽的色彩。

二

宁波商人旅沪创业绵延百年之久，其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有：

第一，宁波商人旅沪所从事的是全方位的经营活动。

宁波是一个既有地理交通优势，又有丰富物产的区域。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宁波商人就在沙船、糖等方面大显身手，接着又向钢铁、玻璃、医药、橡胶等行业渗透。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资本的扩大，其经营活动已广及近代工业、近代轮运与近代金融各业。

旅沪宁波商人既有刘鸿生、朱葆三这些名商富贾，也存在着大批来自农村的以经营农副产品及手工业品为主的临时商人。当时在沪甬航轮上大批“单帮”有许多就是这类人。此外近代中国迭经战乱，太平天国、中法战争时期从浙东农村“逃难”前往上海，后来在上海居留下来的一些人中间有的也是这类小商小贩。就

商人的文化程度分，当时既有从教会学校出来的商人，如周宗良、邬挺生、刘鸿生、王祖庆^①等；但更多的是文化程度不高或者根本不识字的人。即使是从“洋学堂”出来的也主要是在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年的事了。从资本来源来看，既有像方介堂“携三四百金”来沪的；更有白手起家的，如秦润卿以学徒为人生起点，而叶澄衷则是靠在黄浦江摇舢舨才稍有积资。

第二，宁波商人旅沪成就斐然，尤以近代工商、金融业为最。

在商业经营中，最初宁波商人经营的重点在洋布、五金、医药、颜料等新式商业方面。1853年蔡同德首创恒兴洋布店于南京路，同年绅董翁某又创大丰洋布店于南京路河南路东；稍后又有王藕塘、孙增来的相继进入。至1858年上海洋布公所的统计，其时沪上共有11家洋布店，而宁波商人占了5家。1860年后宁波商人向五金、煤铁业发展。初始是叶澄衷的顺记五金杂货号、可炽煤铁号，接着是朱葆三的慎裕五金号、洪益三的慎记五金洋杂号。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宁波商人的五金业资本已占全市的50%以上。医药、颜料方面：黄楚九的中法大药房、项松茂的五洲大药房堪称沪上之最；而贝润生、周宗良的谦和靛油公司则无出其右者。

纺织、机械是宁波商人在近代工业方面的最初尝试。早在1880年，鄞县富商蔡鸿仪^②就参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办，虽然这是家官督商办企业，但蔡鸿仪入股5万两，应该以资本家目之。与此同时，董秋根、何德顺、傅采芹等都对近代机器业投资。其

① 王祖庆，字蓉卿，镇海人。澄衷中学和法国礼尔大学毕业，曾任义品放款银行买办。抗战时期曾与虞洽卿等合伙开设慎记行，经营越南西贡米，发了横财。抗战后因年老将买办职让位于儿子某元。王于1960年初去世。

② 蔡鸿仪，字岷青，鄞县人，望族。其父蔡钧“行商上海擲高资”。蔡鸿仪应省试不售，遂绝意仕进，转而经商。除应李鸿章委札参与创办上海织布局外，在宁波还办有禾盛碾米厂、禾盛烟公司等企业。

中傅采芹的东信轧花机厂堪称同行之首。甲午战争前后宁波商人又趋向火柴、水泥等领域。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排列公司，产量占全国的15%。尔后宁波商人在化工、医药业上也有许多拓进。中国化学工业社的三星牌牙粉、雪花膏名扬海内外，资本达500万元。

宁波商人在金融领域也极富成就。早在宁波商人旅沪之初，就开始创办钱庄。至19世纪末期，宁波商人在上海的9个大钱庄集团（指独家创办4家钱庄以上）中就占了5个。到1921年上海有汇划钱庄^①69个，宁波商人又占了其中的16个，这还不包括余姚籍人士创立的钱庄。19世纪末，随近代新式金融业的崛起，宁波商人又参与了创办银行的热潮。先后创办或参与创办的银行就有中国通商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企业银行等30余家。宁波商人也因之奠定了它在金融业的领导地位。

第三，旅沪宁波商人有着出色的经营才能。

宁波商人敢于开拓，善于经营。早在旅沪之初，他们在商业、钱业界同时并举，扩大资本运作，以及在钱庄开展汇划等，确保了所举各业的成功。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外之间竞争的加剧，宁波商人又在企业机制上进行创新，建立企业集团，实施连锁经营；同时又大力引进先进设备，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在商业服务上则推行以诚为本，信誉第一，改进服务态度。此外还重视信息产业，建立民信业^②，加强同各方的信息联络，保证了事业的成功。

^① 汇划钱庄，又称大同行。旧时上海参加钱业公会的钱庄，因其有权参加汇划总会，其一切票据收解均可用公单互相轧抵汇划，故名。

^② 民信业，指中国旧时民间自行组织的邮递机构，是封建社会晚期商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流行于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宁波商人在这一产业中有很大势力。据悉在19世纪80年代初，宁波就设有永利、正和、广大、福润、全盛、协兴、豫顺、正大等8家信局，此外还有7家小的“外局”。这些信局在上海都设有联号。

第四,宁波商人旅沪既有商业的行为,也有超商业的行为;以此来扩充势力,发展事业。

商业的艰辛使宁波商人很早就有了集群意识。早在明天启、崇祯年间,就在北京设立了“鄞县会馆”。以后又在清嘉庆二年(1797年)在上海创立了“四明公所”。旅沪以后,他们又把这一传统带入上海。在原有四明公所的基础上,以地域和行业为中心,成立各类公所(行会)、会馆。当时先后成立的就有酒业公所、竹业公所、定海会馆等等。1909年起,宁波商人又创立了上海最早的同乡会组织——宁波旅沪同乡会,并通过“敦亲睦之谊,叙桑梓之乐”^①发展会员,最多时曾拥有成员三四万人。此外还组建商人的近代团体——上海商务总会,并利用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人数众多的特点,长期控制商务总会。严信厚、周晋鏊、朱葆三、李云书、虞洽卿、傅筱庵等都长期担任过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宁波商人的这种合群观念,既扩大了宁波商人的影响,又使自己在经营活动中得到种种帮助、庇护和支持。

三

宁波商人研究是中国近代史、近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争议较多的一个领域。如何加强对宁波商人的研究,对于推进整个中国近代史及经济史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

以下仅就有关研究问题谈一些看法:

第一,要认识不同买办的不同作用。目前在买办问题研究中有种倾向,就是综合研究多,微观探索少。因此得出的结论也停留于一般议论。事实上不同买办的作用、地位不尽相同。不说浙江买办有别于广东买办,不说企业买办有别于银行买办,不说某

^① 《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

甲买办有别于某乙买办，即以每个买办个体言，也常会有前后不一。虞洽卿长期担任买办，而他的宁绍轮船公司^①却同外商展开了激烈竞争。朱葆三以民族企业发财，又去赚点平和洋行的佣金；而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他又第一个在大会上当众签字，不订美货。可见深入的个案研究是把买办研究引向深入的关键。

第二，要正确评价钱庄的地位和作用。钱庄作为旧式的金融机构，当然会有一定的封建性。但在进入近代中国以后，由于社会总的经济关系、经济状况发生了变化，钱庄在资本来源、贷款对象、利率水准等方面实际上也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不可同封建时代的钱庄同日而语。既有一定的封建性，这主要指某些规章制度、家长制作风；又有相当的资本主义因素，而且是主要的方面，才是近代钱庄的真实面貌。

第三，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宁波商人同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宁波商人由于与同乡蒋介石的关系而同国民党发生联结，这是事实。这里不言那些中小商人，即以上层人物而论，其实也颇不一致。虞洽卿虽有筹款援蒋上台之举，且也有多次向蒋介石请愿，要求体恤民情之为；而秦润卿则更是出于无奈，态度消极。

第四，要充分认识思想、文化素养在经营中的地位与作用。有些论者在论述宁波帮地位时，比较强调于他们的乡谊扶助。其实较好的思想、文化素养也是或更可能是宁波商人能风骚独领的重要原因。刘鸿生在二三十年代，在外国资本的重重压力下，所以能够顽强拼搏，形成一个拥资740万元的企业集团，就是因他“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作点事”^②。而周宗良所以能在外资商业游

① 宁绍轮船公司，筹建于1906年。1908年集资40万元，向马尾船厂购得轮船1艘并开始营运。1909年起以两艘轮船对开于沪甬航线，即宁绍轮（1318吨）和甬兴轮（1585吨）。虞洽卿是该公司的主要人员之一。

② 《我为什么拥护共产党》，见《新闻日报》1955年10月4日。原句是：“我觉得中国人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作点事。”

刃有余(外资企业有掠夺的一面,也不能否定在中国资本积累中还有另一面作用),并利用买办资本向民族金融业、电力业渗透,则又与他幼时“熟习英语”也有某些关联。

第五,要深入总结宁波商人在近代经营活动中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管理制度。

搞史学的同志对经济活动的研究往往偏重于“史”的角度,而对这些经济活动中所展示的反映经济关系的其他方面,如某些制度、政策(譬如近代企业股份制、联营商业等)常予忽视。其实这是偏颇的。经济关系既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也是史学研究尤其是经济史研究的范畴。只有深入了解这些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这些历史事物。更何况史学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借古鉴今,为现实服务。

总之,宁波商人研究中需要探索的问题很多,只有逐步认识这些问题,才能推动宁波商人的研究,进而推动整个中国近代史和经济史的研究。

四

本书的选编原则是史论结合,以史为主,尽量挖掘传主从事经济活动的实事实例,宏扬其精神,评述其功过。传主主要限于上海一地。但由于经济活动常常是前后连接的,所以也包括写它地的活动,且大都从传主的出生写起,以求观全貌,这样在时限上也不完全限于民国这一段。此外,有个别人物政治活动较多,但考虑到其在经济上也是有影响的,故也一并录入。至于地域上的选编标准,概以今日宁波市区划为准,兼及原宁波府的舟山、定海,此不赘言。同时,在写作过程中,各位作者参考了有关资料和学术成果,有的已经注明,有的没有一一例出,在此一并说明。

一代名商朱葆三

陆志濂

朱葆三(葆珊)，名佩珍，以字行，1848年3月11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出生于嘉兴乍浦。父朱祥麟，在清道光年间任乍浦营都司、定海营游击。清咸丰元年(1851年)，朱祥麟将家眷迁到定海县城居住，此时，朱葆三已3岁，故朱葆三的客籍是浙江省定海县人。朱葆三兄弟两人，弟捷三，一直居住定海。清咸丰九年(1859年)，朱祥麟将家眷移居定海县东乡北蝉村，朱葆三仅11岁。他每天早起从北蝉村步行至定海县城父亲处，回家的时候，在集市买回一些油盐酱醋等食物之类奉侍母亲，徒步往返数十里，习以为常。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朱祥麟身患疾病，亟需求医用药，为此家境顿趋困难。

① 《朱府君讣告》“行状”。